

四

所谓工业发展道路或工业组织形式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所谓经济问题，而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如何看待现代工业所必需的组织形式，乃直接决定现代社会理论的品格。如我们所知，韦伯正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式（所谓理性官僚化）这一所谓必然性出发，进而去追问西方文化传统如何导致这一发展；也是从这一“必然性”出发，他又得出悲观的结论。同样，马克思之所以认为以往所有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只有他的是“科学的”，也正是因为他相信他把握住了现代工业一定是“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必然性”。从这一基本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以后列宁都非常“逻辑”地得出结论：社会化大生产的最高形式自然就是全社会生产的统一管理，即著名的“全社会一厂制”，或用恩格斯的名言：国家接替社会一切管理职能。

中国社会学派的高度原创力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了一种“反必然性的社会理论”之品格。《江村经济》所初步提出来的乡土工业重建问题，看上去非常不符合时代潮流，但它所涉及的其实却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二、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下而上的社会重组道路？如果说，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或许尚未完全意识到乡土工业重建必然牵涉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其四十年代的一系列探索已经相当自觉地从社会最底基自下而上的社会重组道路了，不过这将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费孝通的学术理想

王铭铭

“先生将社会科学与士人的“道统”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不同于自然知识和技术知识的“规范知识”，主张知识分子应承担起重新恢复自然知识、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之间关联的使命，以使中国摆脱“西洋的经济政治的……威权”，同时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合理的转型。”

费孝通先生与世长辞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特别是很多学术遗产。费老的文字大多被收集在已出了16卷的《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版）中，这16卷的文字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留下了先生行行重行行的串串足迹。先生的思想和足迹，带着20世纪中国的众多经验和教训，走进了21世纪，它们在恬淡的语言中得到表述，其意义却非常沉重。

对于费先生的学术，大家知道得最多的，也许是他对乡土中国的结构与变迁的论述，他提出的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内发理论”，及他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中起到的举足轻重作用。在这三大方面，费老确有高度的学术建树，但他的成就不止于此。我认为他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的著述对社会科学诸领域的“中国表述”，都有难得的启发，其论点应得到更广泛的延伸。

费先生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天分、他的历史机缘和他所受的完整学科训练。但我认为，这与他的学术理想关系更为密切。

2003年6-7月，我们几位同事曾有机会到费先生家去请教，我提到他对学者自我定位的早期论述，也问及他的学术理想。费老微笑地提到了他的《中国士绅》（1951年英文版），他

说到，他来自一个绅士阶层，这个阶层到了近代需要适应新的时代，而向各种新职业讨取生活。费老的家族原来属于士绅，到了20世纪初，家族内部已出现各种人，他的长辈有的做生意，有的开工厂，有的做编辑，有的留学，与古代相对单纯的士绅阶层已产生差异。费老说，他正是在士绅的近代衍生史中成长起来的，而他最关心的现象之一，是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的演变。我对费老有关士人和知识分子的论述很感兴趣，问他对此最近有什么进一步想法，他说：

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宽泛，涉及到我最近提出来的“文化自觉”。我的意思是想问，中国文化的几个基础在什么地方？有关这些，我大胆地说说，不一定清楚。

第一个基础，我觉得是家族。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主的国家，这到现在还是没有变，家族的基础没有动，只是收紧了，差序格局的网络小了，其他东西嵌进去了，引起更多的变化，可是基本的变化还是在亲属制度范围内的。提“文化自觉”，实际是因为想到怎样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人同人应该怎样相处这些问题。中国文化里边，有个特别发达的方面，就是人伦，这是人与人相处的规范。从孔子开始，人伦就成为我们一个规范，

成为我们意识形态的思想中心，家族是一种表现。人伦与西方的上帝不同。最近我又看了一下（田汝康所著）《摆夷的摆》（即《芒市边民的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在给这本书写序时，我就讲了这个问题了。中国同西方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孔子讲的，我不知道人，怎么能知道鬼呢？中国人不把鬼当成一个issue，不当成重要问题提出来，人对鬼敬而远之，这并不是要否定神、鬼的存在，我们也祭神，但是重心不放在人死之后。我们更注重活着的人的人伦。这个是我们东方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人伦超越了生死问题，超越了个人问题，它强调人与人如何相处、如何和谐相处这个主题。协调、位育、和谐、和为贵等，在政治方面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权力的问题。“敬皇帝而远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反对皇帝，是更注重人伦。

其次，让我讲得远一点。远古时代中国已有文字，而使用文字的人与不使用文字的人是有区别的。古代士同普通人之别是肯定的，但分别在什么地方？老百姓的社会交往是脱离历史、脱离文字的，而士则不同。文字是一种communication的途径，牵涉到意识形态的传递，本身就是“知之”、“由之”的问题，没有文字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有了文字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文字将两种人分开，与西方的信徒和非信徒的区分不同，我们的社会区分是很实际的，是识字与不识字的实际问题，是文化层的问题。

我过去谈中国士绅问题，没有讲到这一点，没有讲得这么透。现在想来，文字牵涉到社会的基本分化。两种人各有文化，一种是口传的，如taboo，盖房子不能如何如何，老百姓知道了就满足了。我的祖母，她就不讲事情为什么这么做而不那么做，她习惯地照口口相传的规矩去实践，谈不

上变通，她认为男女不平等天经地义，从来不问为什么，她是文化的接受者，不做研究，只照着做。在我们的文化里，历史上出来一种专门考虑问题的人，他们通过文字来记录和研究，引起了很多变化社会变化，造就了士大夫阶层。

我这一代属于士绅阶级，是有文字的阶级，是知识分子。士绅关注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关注人同人怎么相

处，关注忠孝仁义。对于权力是忠，对于父母亲人是孝，对兄弟要公平、要照顾，讲仁义。归结为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强调内看、内观，不让别人做，不强加于人。人伦决定了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基本规律。

我提出“文化自觉”，是希望把中国基本的意识形态讲出来。但这一点我们这一代没有做到，希望你们这一代进一步做一点。



最近我还讲到扩大社会学的范围。人有感情，有看不到的东西，有一个内在的“我”。我可以自己明白自己，程度不深，但可以明白一点，明白自己做人，明白做什么样的人。这不同于behaviorism和empiricism的观点，西方研究社会，要求什么都要看得到、摸得到、闻得到，其实这些是表面现象，现象里边还有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能完全知道，无非比人家知道得更深一点，更有层次一点。陈寅恪审查冯友兰的论文的时候，说学历是要用同情的概念看人，设身处地的想，把自己倒回去。这样做不容易，但只有这样的，才能够读历史，才能深入地理解人的思想状况。人的思想，靠语言去解释不够的，靠语言不一定能看不到“心”。关于这个，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说语言不够了，我能做到的是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感受到的语言之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言外之意”。我认为宋朝的朱熹已发展了这个领域，就是了解人的领域，他讲“心”，讲自己想的，想自己的。我可以理解他当时的感觉，这个东西里面有许多内容，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决定着大家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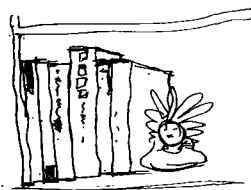
我这代人对这有比较深的理解。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之别，古人叫君子和小人之别，指的就是所谓懂理和不懂理的差别，君子就是懂得道理的，能通道理的。

中国历史一贯有这个东西在里边。士绅这种阶层，不是一个经济范畴，他靠别人养他，靠拥有自己不耕作的土地，实际他们是管思想的人，管社会的人，他们的作用是加强社会的团结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他们负责的任务，可以说是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但西文的integration这个词又概括不了他们的任务的所有意思。应该说，他们的一种重要功能，就是

把人和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社会，成为the social一词所意味的那个东西。中国出来一批士大夫，控制着这个事情，他们成为乡绅，在社会体系上，则成为绅权。绅权是政治体系的表现，以此为基础，出现中国的士大夫。(据2003年6月30日谈话录音整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以后几年，费老反复谈到上面谈到的“文化自觉”，而从他的谈话看，“文化自觉”一说的提出，又与他对自己的文化定位有密切关系，它的意思无非是说，从士大夫的近代化而衍生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应当用文字，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所传承的文化，起一种高于“一般老百姓”的习俗的“社会结合作用”。

怎么理解这种“社会结合作用”？费老的学术理想，早在他20多岁时已明确表露。在早已于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先生谈到我们“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耗费任何财富和能量”。为了避免历史的再度失误，先生主张，“社会科学”应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乍听起来有些像是近代欧洲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东方回声，但实际读过先生在《皇权与绅权》中写的那几篇文章的人都不难知道，对于社会科学的这一期待，恰恰延续了数千年中国士人史的传统。先生对古代士人“为王者师”，“奉天以约制皇权”，对古代王权的“师儒”，都有高度向往，他对于唐之后士大夫道统之屈服，表露尖锐的批判。先生将社会



科学与士人的“道统”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不同于自然知识和技术知识的“规范知识”，主张知识分子应承担重新恢复自然知识、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之间关联的使命，以使中国摆脱“西洋的经济政治的……威权”，同时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合理的转型。

费老总说自己的最后几年愿意以“秀才的身份”来度过，而他最后保留的正式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

记得几年前，我陪同一位英国教授拜访费先生，英国教授问先生到底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先生面带微笑地说：“我还是绅士，没变！”在一旁聆听的我，禁不住心中一阵酸痛：一个世纪老人，经历了多少风雨，却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认同。

4月24日费老跟我们永别了。我特别悲痛。我与先生非亲非故。先生在我出生以前20多年，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大学期间，他那几本陆续重印的旧作——《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皇权与绅权》等，将我导进了学术圣殿。我有幸于先生留学之后半个世纪，去到同一所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同一门学科，并于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不久，回到他创办的学术机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在过去的11个年头里，先生的谈话和著述，都能给我启发和激励。我这代“海归”，不同于先生那代。在所有的不同里头，最突出的也许在于，我们这代容易误以为自己的一点小小成绩已足以否定前代的成就。尽管时代使然的性格不易消除，但先生的微笑使人反省。我反复阅读他的著述，到了21世纪开初这几年，我终于还是认定：这位慈祥老人积累的知识财富值得我们去继承，而这份财富分量如此沉重，以至于我们可能感到它是一种负担——其中有关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诠释，更是如此。